

## 从研究目的看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历史发展

徐富平

(西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民族音乐学(或称音乐人类学)作为一门音乐学科,在我国发端于 20 世纪 20 年代。名称上经历了种种变化。各阶段研究目的既有联系,也有差异,文章旨在对民族音乐学发展不同时期代表人物、社团的研究宗旨进行梳理。

**关键词:**研究目的;中国;音乐人类学;历史发展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34(2008)02-0119-04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的“比较音乐学”到今天一些学者所倡导的音乐人类学,近一个世纪,从最早引进的一种方法发展到呼之欲出的一门独立学科,名称上经历了种种不同的变化。就其发展阶段,学术界也始终存在分歧,有认为以 1980 年在南京艺术学院举行的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为界,经历了“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两个发展阶段,有认为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民族音乐理论”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视为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重要阶段。

进入二十一世纪,学科名称仍无定论。由于“民族”具有太多的歧义使许多学者已不满于“民族音乐学”这个名称,只是由于长期以来的习惯用法而使大家陷于一种两难境地。“目前无论西方还是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以‘音乐人类学’名之。”<sup>[1]</sup>笔者也认为用此名称代替“民族音乐学”也将大势所趋。

现结合著名学者沈洽、杜亚雄、张君仁等人的观点,将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阶段用图表显示(如图 1 所示)。

事实上不同的称呼只是由于不同阶段所强调的不同侧重点而导致的种种变异,学科性质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民族音乐学在不同阶段的研究目的则既有贯穿始终的相同点,也有因不同历史时期、社会背景而表现出的差异。笔者将分别对以上五个阶段的代表人物、社团的研究目、宗旨进行梳理,期望能从一个侧面清晰地用单线条勾画出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

## 第一阶段:“比较音乐学”时期

王光祈、肖友梅、童斐、刘天华等活跃于上世纪 20 年代的一批音乐家,他们所从事的研究被公认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创始阶段。特别是王光祈,1927 年留学德国,第一个接触进化论思想并最早把比较音乐学介绍到国内、介绍到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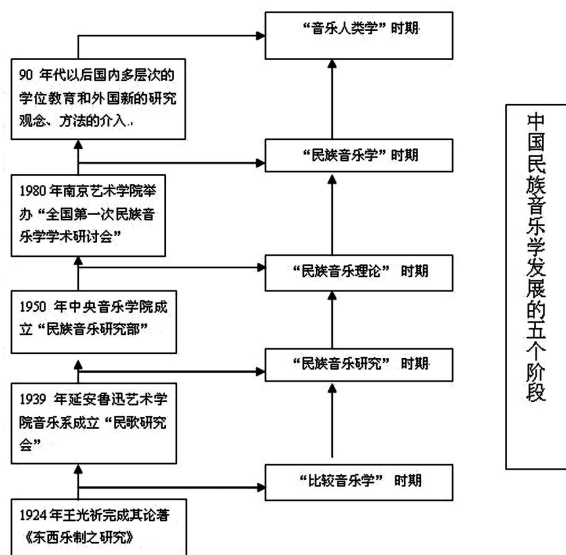


图 1 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阶段图

王光祈在《著书人的最后目的》中说“希望中国将来产生一种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而这种国乐是建筑在吾国古代音乐与现今民间谣曲上面的,因

收稿日期:2007-12-09

作者简介:徐富平(1973-),男,甘肃天水人,讲师,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音乐学。

为这两种东西是我国的民族之声”。他希望其《东方民族之音乐》能作为一本“三字经”，“引起一部分中国同志去研究‘比较音乐学’的兴趣。”在《东西乐制之研究》的自序中写道“吾将登昆仑之颠，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从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sup>[2]</sup>表现出对国乐振兴的满腔热情。在《音乐与人生 Music and Life》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不过‘以乐治心’之说，颇为后代儒家所忽略；甚至于直将音乐一事认为‘末道小技’几乎视为人生不必需要之物。于是，其结果：西洋人虽到白头，亦无不生气勃勃；而中国人虽在青年，亦无不面有菜色。近年国内人士，对于体育一事，虽渐知注意；而对于活泼精神之音乐，则尚十分轻视。至于吾国古代‘以乐治国’之说，当然更无人顾及。

‘枯燥的人生’、‘残酷的人生’、‘以及凄凉的人生’均为民族衰亡的主要象征。补救之道，只有从速提倡音乐一途。”<sup>[3]</sup>

萧友梅也是这一时期研究比较音乐学的代表人物，与王光祈的豪情满怀相比更多的表现出一种无奈（对政府不重视音乐的态度），而且更多的表现出对西方音乐的崇拜和对国乐落后的自卑感，但其目的也是想用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音乐，从而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童斐在 1925 年编写的《中乐寻源》的自序中“希望深入研究并发展民族音乐，不为异国音乐所克灭”<sup>[4]</sup>。

虽然，对他们造成影响的欧洲学者研究比较音乐学的主要目的是以欧洲为中心，以欧洲音乐为标准了解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从而了解整个人类的音乐发展史。而第一代中国民族音乐家则更多的关注本民族的音乐文化，是通过对比的方式了解中国古代音乐，利用当时西方这一流行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音乐，从而达到振奋民族精神、振兴中华的目的。

## 第二阶段：“民族音乐研究”时期

从 30 年代到 50 年代初可看作民族音乐学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如同当时政权分裂的中国社会一样，民族音乐家在两个地区形成了两个研究中心——解放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与国统区重庆的国立音专。代表人物分别是冼星海、光未然、吕骥、张鲁、马可、安波和王震亚、杨荫浏等人。1939 年 5 月，解放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成立“民歌研究会”，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地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1940 年，“民歌研究会”改名为“中国民歌研究会”，1941 年又改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其研究的行为主要是搜集和整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目的则是“力图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音乐创作实践以及‘唤起民众，团结抗日’的政治目的服务。”<sup>[5]</sup>

1946 年，国统区国立音专的学生成立的“山歌社”，其宗旨是“以集体学习方式收集及整理民间音乐，介绍西洋进步音乐（包括技术及批评的理论），普及音乐教育，提高音乐水准，以达到建立民族音乐为目的。”<sup>[6]</sup>

由国共两党分别领导下的这两个研究中心在这一时期不同时段、不同地点从事着近似相同方法的民族音乐研究——对中国民间音乐进行搜集和整理。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是“民间音乐研究会”的发起人，他在《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中对研究目的如是说：“我们民族音乐工作者研究民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其目的还是创作，研究民歌不过是创作的参考材料与根据，必须吸收民歌的精华，创作真善美的民歌。”<sup>[7]</sup>

曾任研究会第二任主席的吕骥在《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中把民族音乐的研究目的列在了第一章节第一个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我们研究中国民间音乐，不应该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研究兴趣，为研究而研究，主要的目的应该是首先了解现在中国各地流行的各种民间音乐的情形。进而研究其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形成历史与演变的过程，获得关于民间音乐各方面的知识，以为接受中国音乐遗产，建设中国新音乐做参考。民间音乐研究并不能解决中国新音乐建设中的一切问题，……中国音乐的建设必须从今天的人民生活出发，只有今天中国人民的生活才是创作的源泉，中国民间音乐只能是一种重要的参考。”<sup>[8]</sup>

另一位音乐家光未然在《向着民族新音乐的道路前进》中说“中国新音乐运动发展到今天的阶段，迫使我们必须将中国数千年来的音乐传统作一深刻的认识，迫使我们须将现阶段之新音乐运动的意义作一真实的估计，并迫使我们根据这种认识和估计，找出一条道路来，用以创造一种新的中国民族音乐——即中国民族新音乐。”<sup>[9]</sup>

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的目的既沿袭了第一阶段振兴国乐的初衷，视野从古代音乐拉到当前，从宏观转向具体（前者指乐制、音乐概说、记谱法等，后者是指把研究对象选定在了当时民间音乐）。又增加了普及音乐教育，提高音乐水准，为音乐创作服务等具体目的，同时还有战争年代特有的“唤起民众，团结抗日”为民族

存亡呼号,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 第三阶段:“民族音乐理论”时期

从 50 年代开始到 1980 年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前。1966 年爆发并持续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把这一阶段劈成三段。文革 10 年处于停顿状态,文革前后的研究特征总体上是相似的。除了对我国民间音乐进行研究之外,对宗教音乐和文人音乐也开展了搜集、整理。“由于民族音乐学、音乐文化学、音乐人类学等学科概念在我国并不普及,有关田野考察的理论、方法并没有在这时候的考察和研究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其研究方法单一陈旧,研究目的则主要是为作曲家提供可以再创造的音调资源。”<sup>[1]</sup>

1949 年,从中央到地方相继成立了一批专门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科学研究机构:东北鲁迅艺术学院的“民族音乐研究室”(1949 年)、中央音乐学院的“民族音乐研究部”(1950 年)、上海音乐学院的“民族音乐研究室”(1952 年)等。这些研究机构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和教学的中心,培养了许多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音乐学家,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期间诞生的学术性较强的民间音乐和传统音乐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如:《民族音乐研究论文集》、《河北民歌采访专集》、《湖南民间音乐普查报告》、《单弦牌子曲分析》、《戏曲音乐研究》、《论五度相生调式体系》、《民族音乐概论》等等。

研究内容一方面是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另一方面是在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形态学的分析。主要目的也继承了第二阶段的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

70—80 年代开始,民族音乐学研究方面最重要的事情当数文化部主持,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规模大、历时长、范围广的传统音乐采集与整理运动,结集建立了中国民间音乐五大集成(民歌、器乐、曲艺、戏曲、歌舞)为代表的有关传统音乐的文字、乐谱、音响、乐器、图片等丰富的资料库。此时研究目的从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那就是,转变了 20 年代以来国人受进化论学派影响而对本民族音乐的全盘否定之态度。对泱泱大国 7000 年音乐史逐渐有了反省和再认识,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音乐有了重新的定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音乐学家对于该学科的研究目的自然是更加脱离不了重现中华民族传统音乐辉煌的夙愿,延续着前一阶段对民族民间音乐搜集、整理,而抢救、保存成为主旋律。但由于理论指导的缺乏,方法的单一

陈旧使得这一时期的研究目的仍然处于为作曲家提供可以再创造的音调资源的低水平阶段。

### 第四阶段:“民族音乐学”时期

1980 年的南京会议,是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虽然经历了两个搜集整理的阶段,但国外相对成熟的音乐人类学等学科概念在国内并没有普及,田野考察的理论、方法并没有发生应有的作用。应时召开的这次会议把我国当时处于迫切而盲目,态度积极而观念闭塞状态下的民族音乐研究引向了一个比较宏观、比较开放性和科学性的境界,“从而把十年动乱中受到极大摧残、当时尚处在极度萧条之中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亚非拉音乐研究’专业复兴起来。并使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sup>[5]</sup>

1984 年 8 月,吕骥在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少数民族音乐专题)上作题为“中国音乐学、乐学和有关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再次强调研究音乐学的目的:“研究音乐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研究而研究、满足我们个人的研究兴趣?还是为着别的什么。我是主张:要从为我们国家的四化作贡献出发,要从促进民族团结,提高我们的爱国主义思想而进行民族音乐研究。这样,我们的音乐学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就联系起来。要怀着这样一个目的去研究音乐学,才能获得发展。既然目的是这样的,我们就要加强从社会科学方面、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不能停留于自然利学,也不能停留于形态学、工艺学这些方面,当然,这些研究都是需要的。更重要的要落实到联系我们的人民生活,要研究音乐发展与我们国家民族发展的关系,要研究音乐发展的根本规律,要研究运用与民族语言的关系,音乐与社会生活、思想、感情、心理状态的关系等等。……广泛学习,深入发掘,深入思索,探索规律,要有益于创作,要推动、发展我们各民族的音乐创作;要起到振兴中华的作用。”<sup>[8]</sup>该发言,首先反思了前一段时期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停留于形态学、工艺学方面研究的局限。从其观点导向来看,认为民族音乐的研究目的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促进民族团结,为提高爱国主义思想而服务。强调了音乐繁荣与祖国强盛的关系,强化了爱国主义思想在民族音乐研究当中的地位。

### 第五阶段:“音乐人类学”时期

90 年代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

范围内的思想交流、学术交流更加方便自由,国外新的研究观念、系统的研究方法不断的被引进。国家对科研教育的投入也逐渐加大,音乐学学科建设的速度空前发展。使得现时的田野考察步入新的领域,与第三、第四阶段资料的单纯收集和分析相比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开始全方位的考察和解释音乐文化生态,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某一地区、某一族群或族群内个体的传统音乐进行深入研究。

学者们在研究中已经表现出一种客观平等的心态,认为对世界各个民族的音乐包括欧洲音乐都要以一种一视同仁的眼光去看待。

杜亚雄在《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中说:“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关于学科的研究目的,他说:“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

展规律的认知。”<sup>[10]</sup>

张君仁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形状与组织机构》和《当代民族音乐学与中国的状态及趋势》中分别提到了研究目的,在前一篇中说“目的在于通过人类的音乐创造现象来把握和认识人类自身。”后一篇中指出:“通过音乐去认识人类文化,认识与音乐相关的各种联系,并进而认识人类本身,认识人怎样创造、应用这一特殊的交流符号,以及音乐这一文化现象是怎样和人的生命、生活联系在一起。”<sup>[11]</sup>

综上所述:一代代民族音乐学家怀着振奋民族精神、振兴中华为目的的良好愿望,从利用西方流行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音乐,到普及音乐教育,提高音乐水准,为音乐创作服务;从战争年代“唤起民众,团结抗日”为民族存亡呼号,为政治服务、为作曲家提供再创作的音调资源到形态学、工艺学方面的研究;从单纯的比较研究到以开放的思维、胸怀来关注全人类的音乐,贯穿着音乐繁荣为祖国强盛服务的理念,中国音乐人类学逐步迈向科学系统的音乐学科。

#### 参考文献:

- [1] 张君仁. 当代民族音乐学与中国的状态及趋势 [J]. 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2004(3): 3-7.
- [2] 王光祈. 东西乐制之研究 [M]. 北京:音乐出版社, 1958: 1.
- [3] 王光祈. 音乐与人生 Music and Life [J]. 教育科学论坛, 2001(3): 1.
- [4] 高厚永. 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 [J]. 中国音乐(增刊), 1981(5): 5-20.
- [5] 杜亚雄. 20世纪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上) [J]. 沈阳音乐学院学报, 2000(3): 26-29.
- [6] 沈洽. 民族音乐学在中国 [J]. 中国音乐学, 1996(3): 5-22.
- [7] 冼星海. 民族与中国新兴音乐 [M]//吕骥. 新音乐运动论文集. 北京:新中国书局, 1949: 124-132.
- [8] 吕骥. 吕骥文选 [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8: 236-253.
- [9] 光未然. 向着民族新音乐的道路前进 [M]//吕骥. 新音乐运动论文集. 北京:新中国书局, 1949: 175-177.
- [10] 杜亚雄. 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 [J]. 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2000, 19(3): 12.

【责任编辑:罗曼菲】

##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thnomusicology from the Purpose of Studies in Each Stage

XU Fu-ping

(College of Music North 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Abstract: Ethnomusicology (can also be called music anthropology), as an independent music field starts from 1920's in China. It has experienced a variety of changes on the name. The purposes of studies in each stage have relevance and differences. The paper aims at analyzing the main purposes of studies in each period of development of ethnomusicology.

Key words: study purpose; ethnomusicology; historical development